

新作聚焦

蒋子丹长篇小说《囚界无边》
重新解放小说

□刘复生

蒋子丹的长篇小说《囚界无边》具有文学史的象征意义,它表明1980年以来成长起来的某些优秀作家正试图打破精英作家的狭隘的自恋,寻求与现实生活建立更为有效的链接,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心态调整。所谓网络写作,或者临屏写作对蒋子丹来说,只是一个手段,这种手段强迫性地帮助传统作家实现了某种深刻的转变。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感和决心,才使蒋子丹最终走向了网络。

蒋子丹从事的并不是网络写作,更不意味着传统作家向新兴文学写作方式的投降。这部小说并不具有一般的网络写作的特征,尽管从形式上看,它似乎借鉴了某些网络写作的经验。蒋子丹并没有放弃自己一贯的文学写作的核心价值和人文关切,甚至也没有放弃原有的文学写作的标准和基本的技术性要求,她没有刻意地去模仿网络腔,或者投其所好地向网络读者示好。

这不是真正的网络文学,但又是真正的“网络文学”。说它不是,因为它没有刻意去追求这个时代网络文学的时尚面貌。当下的大多数网络文学往往流于肤浅,对现实隔靴搔痒,用反抗传统文艺腔的形式重复另一种新的、“小清新”的文艺腔,这是蒋子丹所不能认同的。说它是真正的网络文学,在于它比一般的网络写作更加真切地捕捉到了网络写作所蕴含的,甚至连它自己都不清楚的革命性潜能,即文学与正在展开的生动现实进行链接的能力,通过把生活讲进故事,给现实赋予形式。于是,在小说中,汶川地震、许霆案等社会事件开始进入文本,成为小说叙述的动力和有机成分。通过这种方式,蒋子丹把自己重新带到时代的现场里去,带到具体的历史性当中去,而非像原来她从事先锋小说写作或女性主义小说时那样,完全不在乎当下的生活的真实状态及逻辑。

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蒋子丹十分关心网友的即时评论。其实从写作的技术上来说,网友们不可能向她提供太多高明的招数,不过,倒是会有一些技术性的支持,比如网友提供的关于看守所里

的真实状况等。但是,这些东西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我更愿意相信,对蒋子丹来说,网络写作的策略意义更大,她就是要以这种方式时刻提醒自己进入网络写作的状态,摆脱此前自我沉浸式的传统写作方式和习惯。

蒋子丹试图借助网络写作来克服传统写作的重大弊端,这里的关键是心态的转变。如果对所谓的“纯文学”写作有所反省,上不上网都是次要的;但如果心态没有转变,即便终日趴在网上写作也不会写出好东西。上网写作只是让蒋子丹强迫自己关心那些原来写作时不太关心的问题,比如生活逻辑、经验的真实性和读者的心理感受等等。在以往,所谓纯文学,尤其是“纯”到极致的先锋小说是有意排斥这些因素的。这种网络写作的方式,给传统作家一种压力,让他们被迫进行写作技术上的新选择。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非常吃惊地发现了蒋子丹极其出色的讲故事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我们在她此前的先锋时代里看不到的。其实,故事性及戏剧性一直是小说具有魅力的根本原因,只是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后,才开始对故事性进行淡化。在这种“现代的”、“特定的”文学观念中,似乎小说越不注重讲故事,就越具有文学性,越乏味才越高明。我认为,不管理论家为此发明了多少高明的理论,这种趋势在文学史上都不是主流。问题从来不在乎要不要故事性或戏剧性,而是要什么样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但是,在迷信“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学的时代,我们集体性地中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毒,认为高级的文学作品是不能讲故事的。我觉得,《囚界无边》重新回到故事、人物性格这些看似古典的文学规范上去,这其中包含着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的质疑与反拨,是一种新的小说艺术的自觉。当然,可能这部小说在写作上给人感觉巧合有点多,这些值得进一步商榷。真正的故事性、真正的戏剧性,说到底,就是要用特别的叙事方法给现实生活赋予形式,把生活从沉默状态或混沌状态中解放出来——当然,这种赋予是有限度的,是要超越任何既

定意识形态之上的。

另一方面,借由这种开放性的文学写作,作家得以重新构筑与受众的交流关系,既交流梦想、交流理性,也交流小说技术——于是,文本重新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公共空间。

文学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其与生俱来的价值,但是却在主流的纯文学那里几乎丧失了,以致于我们一想到文学,马上就想到封闭在书斋中以神奇的艺术想象力苦心经营的天才作家,而这也使文学成为自说自话的无源之水。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网络文学才开始流行起来,其实,它是以质朴的、甚至粗陋的形式重申了文学的这种使命,也抗议主流文学的傲慢与垄断。但是,一般的网络写作毕竟是简单的。传统文学由于众多作家的滥用,已经病入膏肓,但却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网络文学也具有随意、浅尝辄止、追随流行的先天不足,除了点不沾真情感和特殊人群的生活场景,网络文学尚没有充分实现其本身的价值。传统的文学与网络文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需要的是互相吸纳而不是互相排斥。蒋子丹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一个传统文学寻求突围,与网络写作方式相结合的富有意义的个案。

《囚界无边》还有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我们都应该知道,蒋子丹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曾是非常活跃的先锋作家,创作了不少先锋性的文本,而且一度性别立场非常鲜明。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的个人创作经历,她的写作转变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其实,近年来,蒋子丹的写作已经悄然实现了从一个冷漠的先锋作家转变为一个人间温情的看护者,这部《囚界无边》延续了这条路线,小说对人间的道德力量甚至人性向善的本能是有信心的。在小说中,即使是那些所谓的坏人,比如龙强彪等,在特定的情境下都是渴望做一个好人的。相对于当年的阴郁的、先锋的深刻,这是一个后撤,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进步。我认为,蒋子丹的转变表明,她在反思自己既往的创作,也在反思所谓纯文学的那些前提,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

写作的意义,或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上来了。

文学是什么?我们从事写作的最终理由何在?这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是在1980年代,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从事写作是因为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先锋小说就暗含了这种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假设。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写作,可能是因为有高于文学的东西需要我们用文学去看护它。这又回到了关于文学的古典理想上去:文学是为让人心变得更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这种传统的关于文学的理论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中,是不太被人们接受的。更何况,西方现代主义的那些文学观念一直在告诉我们,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在先锋文学流行的时代,很多作家认为,好的文学就是要把人性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他们笔下的人性的复杂性更多地是指人性的阴暗面。所以,先锋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看起来是比较冷漠甚至比较残酷的,而这也被认为是深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其实带有对人性谅解式的肯定意味,这是1980年代的时代语境所生成的特殊意义,而且,当时整体的文学环境比较健康,所以先锋文学其实是对其做了一个有效的调剂和互补。但是,后来整体的文学生态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所有的文学都趋向于冷漠,包括新写实、新历史小说,以及广泛的欲望化写作的潮流,先锋文学没有什么东西垫底,这就导致了伦理意识的丧失。极端一点说,文学有教唆人变坏的嫌疑,而不再坚持追求好生活的信念了。于是,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最初的积极性功能丧失了。其实,这也是主流的纯文学失去读者的原因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中,蒋子丹重新回到原先写作初衷上的实践才显得弥足珍贵。既然我们所从事的纯文学现在的意义和功能与之前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如果要坚持,寻求突破的路径又在哪里?我觉得,网络文学提供了写作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网络文学本身并不能够有效地得以释放,所以需要传统文学的力量介入,需要网络与传统作家的有效结合,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全新的写作局面。在这一点上,《囚界无边》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不管《囚界无边》这部小说本身达到了什么样的文学水平,这样的转变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事件。

创作谈

自从我的长篇小说《囚界无边》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我也从菜鸟“老猫如是说”,还原成老手蒋子丹。对我略知一二的读者和记者,以及熟悉我的朋友们,多少都有些惊讶,因为在20多年前,我的作品似乎已经被归入了先锋小说的行列,前几年在三联出版的《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又属于文史哲不分家的跨文体作品,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讨论了动物保护问题,这回忽然跑到网络上去写长篇,而且是每天现写现贴,好像有点不靠谱。看过这部小说的朋友们都说它一点不像我写的,我明白,这是由于我以前的小说没有这么写实,很少有戏剧化的故事,节奏可能舒缓一些,文字也没有这么口语化。究其原因,我觉得跟网络写作这种方式无关。

先说文字口语化。在网上写作会觉得时时有一些读者隐身在自己周围,听你讲故事,并随时都可能与你交谈。这个语境要求你不能自说自话,不能用文绉绉的书卷语,非得生动形象不可。当然我并没有刻意去使用那些网络上很流行,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太使用的网友专用词汇,因为我并不熟悉它们。

再说故事的戏剧化。《囚界无边》是一部以看守所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具有隐秘性的场所,是因为这里方便集合社会各方面、各阶层有特殊经历的有故事的人物,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相交的命运轨迹,很自然地交叉甚至纠缠。小说里很多故事很多,囚犯与警察、囚犯与囚犯,警察与警察,都处在非常紧张的关系中,当监仓里发生命案,各种矛盾解难分际,大地震突然降临,颠覆了人物间既有的关系,也给他们提供了出人意料的行动依据。看守所生活已经属于非常态,地震冲击下的看守所生活更是非常态之中的非常态。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紧张,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到了趋于巧合的地步。我以前写小说轻易不使用巧合的手法,因为那些小说并不注重故事,而这部作品既然是写故事,大可不必忌讳巧合,要做的就是把握住一点:不要让这些故事和人物假模假式。想让故事真实可信,还得借助作者人生阅历的积累,无论调动想象来演绎,还是依赖推理来演绎,都得有一定的生活积累做基础,不能胡编乱造。

有个名叫“老猫你好”的网友,是个坐过十几年牢的人。他发给我资料,证明他的说法不是虚构,一直跟着看,一直跟贴。他说他原先非常害怕回忆那段生活,但我的小说吸引了他,他很希望我能写好,说还是涉及监狱的问题,只要我发问,他将有求必应。后来他给我发过不少参考资料,从建筑格局到法律条款,以及亲见亲闻的个案,并在几个关键细节上给我提供了特殊的咨询。写到后半部的时候,他感叹说,故事和人物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这个亲历者的经验和想象,他不能再给我提供什么帮助了。他的这个说法,被我看做是极高的评价,至少对我的想象能力和演绎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最后说说节奏和悬念。在网上每天贴一章,有点像电视连续剧一天一集。网上读者流动量很大,闹得太久了的人物,再出场就会变得没有来由。这倒是让我不自觉地找到了某种结构的方法:一个人物表演了一阵子,叫他下台休息在旁边候场,但要给他留一个再次出场的理由,或者说一个留待叙述的线头,其实这就是悬念。悬念留下的一个个扣子什么时候解,先解哪个后解哪个,又成了必须考量的技术问题。边写边贴,看似想到哪段写哪段更加自由,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成了最大的限制。帖子贴上去就动不了了,不能像闭门造车写作时那样,随时调换顺序,反复把玩再出手。这实际上左右了你的故事结构,甚至在最后整理的时候,都无法再重新洗牌。这次的写作经历再一次告诉我,所有的自由都是有限制的自由,而艺术永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人们总习惯于把传统作家和网络作家划一条界线,像我这样“脚踩两只船”的写手似乎不多见。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喜新厌旧”的人,找不到能让自己感到新鲜的触发点,就很难提起精神来创作。网络写作的试验,在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经历,以当时的点击量和跟帖来观察,网友们已经接受了我这只菜鸟。这就足够了。

蒋子丹

新作快评 叶舟中篇小说《FROM:马里兰TO:兰州》,《人民文学》2012年第2期

经济全球化中的价值迷乱与找寻

□赵振杰

叶舟的中篇小说《FROM:马里兰TO:兰州》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将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巧妙地串联起来。作者有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视野下,借助美国的世态人情来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迷失与找寻。

小说开始于美国马里兰的格雷特郡,一对劫匪(齐·贝尔和威廉·萨默塞特)在一天午后企图打劫一栋单体公寓,这栋公寓里居住着一群为了让孩子们将来能够享受美国免费教育,而从中国偷渡到美国生产的孕妇们。与此同时,这两个劫匪的打劫准备和行动又被里克·布莱恩(一个失业的老邮差)和山姆·斯佩德(一个19岁的无业游民)发现。不过,他们并没有及时报警,因为他们也是非法潜入艾米丽·陈公寓的。艾米丽·陈是一名中国掮客,而那两个劫匪所要打劫的公寓正是艾米丽·陈所经营的“月子中心”。结果两个劫匪的打劫行动,如老邮差的推测

一样失败了——一个被当场击毙,另一个因熟悉地形成功潜逃。之后,酒鬼老邮差怂恿山姆去“月子中心”寻找些值钱的东西,结果他却带回来一封寄往中国兰州的信,暗暗爱慕着艾米丽·陈的老邮差出于职业的操守,最终将信寄出。

在这段混乱离奇的故事中我们似乎感受到一种“美国的中国式温情”与“中国的美国式癫狂”。贫穷而不失善良的老邮差与浅薄荒诞的中国孕妇们的对比,反映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然后,小说的视角转向中国兰州,嗜赌如命的4S店董事长洪哥收到了那封署名“齐丽”的信,而“齐丽”是借用洪哥哥的小半女朋友的名字。洪哥并没有拆信阅读就命令小毕将其撕毁,而表面忠诚效命的小毕却私下拆看了信的内容。在女友的追问下,小毕将自己揣测了出来:他认为,这个写信的女人与洪哥有生意上的往来,由于

生意没有谈成,就企图勒索洪哥,洪哥没有答应。真实的情况作者并没有透露,但我们可以推测,寄信人应该是洪哥的情人,被洪哥骗到他妻子艾米丽·陈在美国的“月子中心”生产,而艾米丽·陈在此时却携款逃回国,在国内,在美的孕妇就此失去了与洪哥的联系。

作者讲述的兰州故事打破了线性的逻辑叙述,中间穿插着小毕与洪哥的相识、捡到“苹果”的小毕与手机失主之间的故事、小毕女友对工作的讲述等情节,给读者带来一种晕惑感和混乱感。显然,作者要通过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迷乱。生活糜烂的洪哥、谙于世故的小毕、放浪轻佻的手机女失主,还有落下职业病却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毕女友,共同构成了中国当前的实境图,也揭示出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贫富差距悬殊、道德滑坡、物质坚硬、思想迷乱、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尖锐冲突等。

小说最后,小毕与女友齐丽的脉脉温情似乎寄托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怀念,但结尾处艾米丽·陈的电话又将读者从浪漫的梦境迅速拉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

短评

以名为记“新红颜”

□李林荣

牌、不贪规模大,也是逐年累月地在收缩地盘,坠落水准。自然就更不用说,在整体功能渐趋暧昧,对外作用愈益疲弱的文学家族里,诗还能发挥多少如火如电、如闪电、如利剑、如风雷般的警世、喻世与明世的突出效力了。身为在海子等人尚且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北大校园里走过去、待过、涵泳过、沉漫过的一代热血“文青”中的一份子,毕光明该是有情结的人——对于那时候的诗,以及诗一样的青春和文坛,还有震荡、回旋、盘绕在青春的校园和文坛之上的诗样的梦与誓言。

谁能知道呢?如今,这一切都沉降、深埋到了文学史的地表以下,成了必得靠知识考古学和史料勘探的挖掘才能被人所见的遗迹和遗产。或许正因此,面对眼前一刻也不稍停的塌陷,进而被埋进当下泛滥成灾的话语泡沫或者记忆黑洞里的诗歌、诗人,毕光明和他同好们,如李少君、张德明,及《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这本书中其他各文的作者们,带着珍惜之意,更是带着同情和见义勇为、目不忍睹的心思和神情,其切实的力度和强度,也抵不上在文学史考古谱系的比照下,由那时后重新发掘、关注它的人沉吟出的一句低语,更耐得住光阴和事理的检验。

坦率地讲,我不太喜欢“新红颜”这

名目的成分搭配。“新”字太招摇,“红颜”又太古板陈腐,二者连为一体,好像把老奶奶箱底压久了的一匹沾足了樟脑球味的绫罗,拿来剪裁、缝制成巴黎T台上的时装。一时令人辨不明,这是要宣示前卫,还是要凸显怀旧?不过,我能理解这名目的“功夫在诗外”的价值和寓意。那就是,它意欲为未来的文学史驻留些什么。首先是关于当今诗歌写作现状某一方面状态的确切印記。其次,还有与这些印記紧密相关的诸多意见、看法、观点和主张。考古者总希望他的铲子下面碰到的实物,不仅形状完整,最好还能有记号,哪怕是不够精美、不够准确、不够合理的记号,只要它出自现场、发于当地,指称和关联着历史某一时空内的实存,那它就是可贵的,可贵到无可替代,毋庸旁借即具证实伪的凭信力和说服力。

李少君、毕光明他们所标举的“新红颜写作”,对于21世纪新兴的网络写作大潮里的女诗人及其诗作而言,具有深刻久远的铭鉴作用。有了这样的命名,这个被新传媒吞噬一切符号的、沉默而喧嚣的大时代里的一代女诗人们,将无需担忧自己的写作会被抹杀在历史之外或是符号垃圾之下。至于“新红颜写作”这名目的实质内涵,我想,今天即使形成众口一词的所谓共识、同感,其切实的力度和强度,也抵不上在未来的文学史考古谱系的比照下,由那时后重新发掘、关注它的人沉吟出的一句低语,更耐得住光阴和事理的检验。

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
情
明

广告

本期看点:

振聋发聩的报告文学《刘道玉: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中篇小说《北京房东》揭示当代人婚姻危机与情感困惑;新锐作家毛建军继《北京人》之后推出中篇小说力作《虎烈拉》;短篇小说《下山去看红绿灯》以别致的结构和纯美的描写,揭示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的激烈冲突。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2年第七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为回报读者厚爱,本期开展读者大酬宾,内容增加一个印张(即十六个页码),定价不变,每期8.00元。全国最实惠的原创文学月刊。如读者在当地买不到本刊,可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钟山

《钟山》(双月刊) 邮发代号28—3 全年90.00元
《钟山》长篇小说(半年刊) 邮发代号28—310 全年40.00元

《钟山》双月刊2012第四期目录

活在伟大的鬼魂中(对话) 杨炼 乔治·塞尔斯

非虚构文本

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惨案 王彬彬

母亲的思想 金学东

忏悔——一种心灵的救赎 程树榛

钟山记忆 黄宗羲:裸葬的情怀 李洁非

江南风流 聪明一世 范荣会

我刊电子版,常年接受征订,欲了解详情,请登陆《钟山》网站:www.zhongshanzazhi.com

《钟山》双月刊合订本

应一些读者朋友的要求,编辑部分别精装了部分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钟山》(双月刊)合订本,并邀请方平、叶兆言、毕飞宇、陈应松、苏童、范小青、赵本夫、黄蓓佳等众多著名作家联合签名。一年一册,定价相同,每册88.00元(含邮资)。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欢迎 邮购

款寄:210019南京梦都大街50号《钟山》杂志社毛全星女士收,免邮资。务必写清您的姓名、邮编、通讯地址和邮购内容。联系电话:025-86486038。

中篇 红宝马 王晶朋

远河 董立勃

野棘坪 刘太白